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史镜

钱大昕的家族家风

□ 王维家

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德行高尚，一生汲汲于学术，在经学、史学、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诗文创作等方面无不成就卓著，被公推为“一代儒宗”。钱大昕能在为学为人上达到此种境界，固然是其自身努力所致，同时也是与他受到的良好家教家风熏染分不开的。这种家风，在他所写的《记先大父逸事》这篇文章中有着极为鲜活生动的体现。

其祖逸事 泽被后人

先大父是钱大昕对去世的祖父钱王炯的尊称。钱大昕在这篇随笔中，以简练写实的笔触深情追忆了祖父生前的四件“逸事”：第一件，处事不欺天罔上；第二件，做人力戒自满、不妄求利与福；第三件，读书须有创见；第四件，老犹读书不辍。这四件逸事看似不起眼，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祖父德行高尚、嗜书如命的品性，而其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所形成的良好家风对钱氏家族向善向学的人生追求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先看第一件事。祖父69岁时适逢朝廷下诏，对年满70岁的老人赐给粮食和布匹。为求得赏赐，乡里很多人弄虚作假，“增年以邀上赐”，有人劝他也虚报年龄，被他“正色”拒绝，“欺天而罔上，吾不为也”！这件事给了钱大昕深刻的影响。在祖父看来，弄虚作假行为涉及人的品德，是关乎“德行”的大问题，做人先立德，做事不违德，这是基本的古训，必须自觉遵循。祖父对弄虚作假的正色拒绝在幼小的钱大昕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记，特别是当他听说有些秀才为得到朝廷对年满80岁者“特赐举人”的照顾时，竟然胆敢虚报“一纪”（12年）年龄以捞取好处，这种有亏“德行”的行为强烈地刺激了他，也成为他写作此文并将之置于四件“逸事”首位的一个重要缘由。溯往查今，在年龄上弄虚作假者代不乏人，钱王炯的这一举动，不仅是钱氏家族“做人先立德”良好家风的生动体现，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

再看第二件事，钱王炯列举《管子》《淮南子》等书中的名言警句，“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前者告诫家族人“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要求族人谦虚恭让，谨言慎行，力戒骄傲自满，言行无忌；后者告诫家族人要安分守己、安贫乐道，如果一味妄求富贵利禄，反而可能招致祸灾。钱大昕通过展示祖父的寥寥数语，深刻反映了祖父的做人准则，这些准则一样是钱氏家族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揆诸史实，正是有这样良好家风的熏染、激励与规范，钱氏家族世代向儒，奉公守法，很少有违法乱纪的不肖子弟出现。钱大昕本人，学富五车，淹贯文史，终其一生，始终秉持“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精神，平允谦和、薄责于人的学德，不妄求、不妄语，一代大儒的处世风范、人生轨迹值得我们好好地去体味，去思考。

第三、四件事都是关于读书的。钱王炯认为，读书不能一味死读，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做到了这点，才是真读，也才会有收获。钱大昕在文中列举祖父如何理解古人用韵对偶两个典型例子，深刻地表现出祖父活读书、读活书的读书方法与实践，极具启发性。同时以“年逾八十，读书不辍”八个字和“一日不读书便俗”的自白，刻画了祖父嗜书如命、活到老读到老的动人形象，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家风流传 荫庇子孙

对于钱王炯来说，一心向学、立志读书是他的毕生追求，也是钱氏家族最为励志的家风，代代相传。史载“文字外无他嗜好”的钱王炯，“生而颖敏，好读书”，“亲旧家有藏书，辄借读之，虽盛暑沍寒，未尝一日少辍”。在祖父的要求下，父亲钱桂发亦“少承庭训，以读书立品为务”，“不屑屑记闻章句，习举子业，涤烦去滥，壹以先正为师”。到了钱大昕更是如此，他周岁即能认字，3岁能诵堂上匾联，5岁受经书，10岁学为八股文，被乡人目为“幼慧”“神通”。钱大昕曾在《严久能娱亲雅言序》中针对学人学养不够说过这样一段话：“予谓可以两言决之，曰：‘多读书而已矣，善读书而已矣。’胸无万卷书，臆决唱声，自夸心得，纵其笔锋，亦足取快一时。而沟浍之盈，涸可立待。小夫惊而舌挢，识者笑且齿冷，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同父祖一样，多读书、善读书是他治学的心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虽然胸罗万卷，也不率尔为文，恃才傲物，这又践行了其家族“戒满”的祖训。

相比父祖，钱大昕无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著作等身，名满天下，泽被后世，其实不只钱大昕，因饱受家风熏溉，钱氏家族名家迭出，享有盛名。请看清代著名学者江藩在其《国朝汉学师承记》中的评价：“先生（钱大昕）之弟大昭，从子塘、坫、东垣、绎、侗，子东壁、东塾，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可谓东南之望矣！”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其《清儒学案》中对钱氏家族也推崇有加：“当惠（栋）、戴（震）学说盛行吴、皖，而潜研（钱大昕）崛起娄东，于训诂、音韵、历算、金石无不淹贯，尤邃于史。后儒分其一节皆足名家，乃兼擅众长，不自矜诩。著述宏富，闇然日章，其德养为不可及。群从子弟互相砥砺，朴学风尚萃于一门，可庐（钱大昭）、溉亭（钱塘）尤深造焉。”清代以后，嘉定钱氏家族亦不乏名人显达，这不能不归因于良好家风润溉之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并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家风建设，形成了许许多多感发人心的优良家风，钱大昕钱氏家族的家风，无疑是中华民族优良家风百花园中的绚丽花朵。



郭嵩焘的吏治观

□ 吴敏文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晚清湘军创建者之一，1863年任广东巡抚，中国首位驻英法大使，洋务派名家和著名的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家。郭嵩焘认为，对于吏治，最为关键的就是两个方面，即“严”与“实”。

郭嵩焘认为，“严”就是“认真”。对于道光以来的吏治腐败，他批评朝廷“一意宽假在位者”的错误做法，在一次与友人谈话时说：“国家立法，本以惩奸顽。但无废法、无枉法而已，而严在其中。今之为吏者，严以御民，而宽以御胥吏，而下及盗贼。”郭嵩焘在解释他的“吏治以严为尚”时说：“严非刻也，事事认真便是严。”他对“认真”二字十分重视，并要求首先从皇上做起。咸丰八年（1858年），咸丰召见他，问“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他对曰：“皇上诚能遇事认真，挽回天意，天心亦随皇上以为转移。”咸丰又问：“如何便能转移？”郭对曰：“不过认真二字。”言下之意，即“一国君主办事能认真，便能转移一国之大局”。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咸丰转眼即为颟顸无识的朝臣所惑，晚清局势终于无可“转移”，直至糜烂殆尽。

细审郭嵩焘的“认真”二字，对君王和上官而言，“选官”要认真。郭嵩焘说：“天下之治乱在乎用人之当否。所用贤，则纪纲振饬，法度修明，虽乱世亦可以为治；所用非贤，则纪纲倒置，法度废弛，虽平世亦可以为乱。从古至今，未闻费有用之财，养无用之人，啖之以利而求其不作乱者。”吏治是否修明，取决于官吏的素质；而官吏是否恰当其位，又取决于用人者的考察。如果在上者不认真考察所用之人当否，吏治的清廉就难以保证。对下官而言，“为官”要认真。为官认真必须德才兼备。古人云：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无才，德是无源之水；无德，才是洪水猛兽。郭嵩焘尝言：“修身、齐家、治国是一件事。正己以端其本，此修身也。侧门以内整齐有法度，胥吏奉职行文书而已，此齐家也。出身与民相见，此治国也。身苟修矣，齐家治国何有哉。”显然，他在这里已将“家”的范围扩大到了衙门。而要修身，就必须去私。因为一有私心，在用人之时就会分不清君子小人，只要能“悦己”即可；在行政时就会辨不清是非，只顾对自己有利。所以，郭嵩焘说：“君子之行政，以胜私为本。”不要孜孜于名利，“君子而有意乎为名，其弊必中于天下”。又说：“好名之过与好利等，而害尤甚。”郭嵩焘认为，一个官吏只要能胜私，就能正气凛然，不逢迎，不拍马，办事公道。

郭嵩焘认为，为官之道的“实”，就是要认真培养一种务实精神。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致友人陈孚恩的一封信中说，自己通过三年在朝廷工作的经验，“推求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处理问题不调查研究，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只知道照葫芦画瓢，抄袭陈例，应付差事，这就叫作“以例文相涂饰”。这样的从政态度，当然只会使“事皆内溃”。正是针对这种弊端，郭嵩焘提出：“毋亦稍宽假以例文，以求理财行政之实效，天下事其犹可为乎？”宽假为宽贷、宽容之意，就是说不要把例文看得太死了，要更多地考求理财行政的实效。郭嵩焘这种重“实效”的态度，正是他一贯注重务实的实学精神的反映。在他历任驻英法大使之后，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这种务实精神又有新的认识。西方注意对天时、地利、人情之研究，并力图“考求其实”，而中国恰恰相反，“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通过这种对比，郭嵩焘更加痛恨中国官场“以例文相涂饰”的官僚主义，并希望各级官吏能认真注意务实，办事更加重效。

平心而论，郭嵩焘对于吏治的“严”“实”要求，本不是什么难以企及的高标。归纳至简，就是“办事认真，讲求实效”。办事认真是主观态度，讲求实效是客观效果；只要办事认真，则“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何难之有？

古人的“书人合一”

□ 张利国

近日，天津前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落马，黄给“宁波城市展览馆”的题词被工人摘除。这种现象并非发生在黄兴国一个人身上，有些官员在任时，字因人贵，其“墨宝”洛阳纸贵；一旦贪赃枉法、身陷囹圄，字因人废，“墨宝”甚至变为废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字因人贵与字因人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为何字因人贵、字因人废呢？北宋欧阳修认为古人都可以写字，但只有贤者之书才能传承久远，其他人的书法都被历史淘汰了，原因在于“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苏轼在老师欧阳修的基础上提出了字因人贵的思想：“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北宋沈作喆认为要远离奸佞人之书，因为“佞人书迹”容易对人造成染污：“佞人书迹，入眼便有睢盱侧媚之态，惟恐其污人，不可近。”可见书法中可以反映出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书法过硬的前提是人格修养过硬。如果某官员贪赃枉法，通过书法敛取钱财，那么他的书法水平再高也不会得到社会认可，更谈不上传承有序，何况这些落马官员的书法艺术水准并不高。

领导干部喜欢书法，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他的艺术水准很一般且将题词作为变相造钱的工具，那就不但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而且违背了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七条规定：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不让领导题词，是为了减少雅贿的机会，营造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清正廉洁的形象，历史上不乏其人，唐代颜真卿是典型的代表。自北宋欧阳修以来的文人士大夫推崇颜真卿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人书合一”，即书品与人品融为一体。颜真卿“书如其人”表现在：“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颜真卿“人如其书”表现在：“颜公忠义之节，皎若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颜真卿的政治形象、忠义气节以及书法艺术融为一体，其书如其为人，受到历代书家、文人士大夫等阶层的大力推崇。颜真卿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体现，更是士大夫的励志榜样。

然而北宋奸臣蔡京，身败名裂，其书法也受到连累，字因人废，最终遭到后人唾弃。“苏黄米蔡”本来是按年龄进行排序，特指北宋四位杰出的书法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但是由于蔡京“人品奸恶”，其历史地位无法与“苏、黄、米”相称。后世将“苏黄米蔡”之蔡京换为德高望重、忠国兴邦的蔡襄。元代书家郑杓在《衍极》中说，遇到蔡京书法都要“掩鼻而过”。南宋岳珂同时警醒世人，以文艺自居者，不得不重视自身名节，否则其文艺无法得到世人的认可，更谈不上传承有序。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认为“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文人士大夫虽身怀绝技，但如果人品恶劣，蒙羞于世，则不得不引以为鉴。

清代傅山曾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字因人贵与字因人废的审美观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如果一个人因为违反党纪国法锒铛入狱，那么说明他的人格修养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人的书法可能流传于后世，那么其人与其书要经得起历史考验。落马官员的人品与书法连几十年的考验都经受不起，何谈久远？他们的书法最终和蔡京、秦桧等人的下场一样，遭到后人唾弃。明代项穆说：“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

有所思

环球史话

“美苏中心”格局中的战略革命

——近代以来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二）

□ 张一飞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国际范围内的权力结构逐渐明朗：欧洲因战争破坏而陷入涂炭，美国因远离战场而保全实力，苏联因战争洗礼而潜力爆发。从北半球开始，进而拓展至全世界，美国和苏联的权力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趋势十分明显。尤其在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组织建立起来之后，除全面战争的军事手段，美国和苏联进入全面对抗。

如果说欧洲五强之间是象棋的博弈，必将对方摧毁殆尽而胜出；那么，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博弈更像是围棋的博弈：是对圈定范围的争夺，不可能彻底消灭对方，进行“势”而非“力”的较量。导致博弈规则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美苏两国都看到了世界范围内在二战后的厌战情绪，率先挑起全面战争的一方一定失道，处于必败之局；二是美苏两国在二战后都是有核国家，核战争同归于尽的风险使双方不得不按照更加理性和谨慎的游戏规则行动；三是美苏两国的整体非核实力大致相当，权力的平衡一时之间难以打破。在博弈双方从下象棋到下围棋的过程中，至少出现了三点战略革命，这些战略革命的结果一直影响至今。

从克劳斯维茨向孙子逻辑的转变

以《战争论》闻名于世的克劳斯维茨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两个核心观点：摧毁敌方的军队是第一要务；要摧毁敌方军队就必须尽量促成主力决战，以会战的形式消灭敌方武装。这一军事战略思想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都主导着西方战争史，战争双方通常会寻求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在会战中歼灭对方武装。

然而，《孙子兵法》中的观点与克劳斯维茨的观点针锋相对：上兵伐谋，使敌方意志屈服是最高明的战法；以“全”争天下，不仅要保住自己的国家、军队和百姓财产的“全”，也最好能够保障敌人有生力量的“全”，这样才能得到所有人的拥护。孙子的逻辑是最好不用战争；如果不得已，则要尽量减少战争的破坏力。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克劳斯维茨立足于“破”，孙子立足于“全”。在军事战略的选择上，美苏两国在二战后基本不具备执行克劳斯维茨战略的条件，双方都进入了试图屈服对方意志而非摧毁对方力量的较量（上兵伐谋）；都会以和平主义者自居（以“全”争天下），诱使对方侵略。1979年，苏联主动入侵阿富汗，成为众矢之的，正是没有按捺住战略冲动而寻求决战的潜意识作怪，重走已经过时的克劳斯维茨的老路，直接导致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迅速衰落。

从拿破仑向孔子思想的转变

拿破仑作为征服者，至今“余威震于殊俗”。尽管拿破仑战争中，法国通常作为被迫反击的一方，但那只是进攻者拿破仑受形势所迫的理性选择，一旦掌握主动，便倾向于以军事手段争夺霸权，如拿破仑对西班牙、海地、俄国的主动进攻。

与拿破仑相反，孔子反对“不义之战”，倡导“仁”和“礼”的概念，事实上，这样的概念既是维护秩序的稳定器，更是一种对外战略工具。孔子构建的以“仁”为基本精神、以“礼”为行为表现的等级体系，是使非文明向文明主动归附的体系，是以自身文化吸引力获得真心臣服和融入的体系。与这种文化战略相比，军事征服不论从成本计算还是事后统治来看，都落入了下乘。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拿破仑立足于“去”，孙子立足于“来”。在文化战略的选择上，如前文分析，美苏两国在战后不具备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条件，军事手段不再是首选，需要新的战略工具。出于对自身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自信，美苏双方都在意识形态领域追求对方阵营成员的主动归附，相当于围棋中的“提子”，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舆论战、宣传战、理论战、实践战，其文化战略交锋的激烈程度并不逊色于任何正面战场的军事对抗。

从俾斯麦向韩非子战略的转变

俾斯麦作为外交战略大师，在德国地缘条件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德国编织了一张笼罩欧洲的外交“蜘蛛网”——所谓的大陆同盟体系，其作用不仅是要德国没有准对手，更是要德国在任何恶劣的外交条件下都有调整的余地和最佳的退路，后者的难度比前者难度更大，对外交战略的设计者和实践者都提出了超常的要求。

与俾斯麦相反，韩非子从根本上鄙视外交的作用，他认为盟友极不可靠，国家安全必须依靠自己，提高自身实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法门。所谓“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完全体现出了韩非子在战略上的内向性倾向。韩非子认为将国运寄托于外交是危险的，外交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境遇，还会给国家造成“已经安全”的假象进而误国。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俾斯麦立足于“外”，韩非子立足于“内”。在外交战略的选择上，由于两极体系中的两极在实力上占据绝对的超然地位，在各自阵营内可以发挥完全的主导作用，除了对个别大国的外交争取之外，世界被分为明确的两大阵营，留给两极发挥外交战略的空间日益缩小，美苏两国都意识到俾斯麦的成功无法复制。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苏双方不约而同地转向内部升级，美国的升级体现在科学技术上的革新，而苏联的升级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革新。苏联的解体是美国科学技术革新成功和苏联意识形态革新失败双重作用的结果。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和苏联“新思维”几乎同时问世，标志着冷战的一大高峰，最终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并非外交战略的失败，而是内部改革的失败，完全印证了“其内也不固，其外也不达”的战略预判。

尽管冷战已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结束，但是发生在其间的大国战略革命一直影响至今，几乎给后来大国打上了不可逆的战略选择烙印。首先，从“破”到“全”成为军事战略的共识。在当代，不论是任何武装力量之间的战争，是否“以全争天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确认“义”方与“不义”方的基本标准。比如，恐怖主义之所以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与打击，正是因为它违背了这一军事共识，以“破”争天下。其次，从“去”到“来”成为文化战略的倾向。当代的主要大国塑造自身国际形象，弘扬本国文化的过程就是实施“以德服人”、追求归附的文化战略的过程。这种文化战略没有具体针对对象，没有固定战术模板，没有最终成功标志，但反对强力屈致，坚持以某种文化、价值、制度上的吸引力消除对抗，为本国营造好的发展环境。比如，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就是这样一种非暴力、致和平的文化战略，追求不“去”而“来”。最后，从“外”到“内”成为外交战略的潮流。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洗礼，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结盟外交进行反思，许多国家意识到，集体安全同盟在一定条件下往往是升级冲突甚至点燃战火的罪魁祸首，更加理性安全的战略应该将国内治理放在首位，不设定假想敌，不实践对抗性外交战略，以本国人民幸福和世界和平为国家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将国内治理作为对外交往的基础。